

的知識準備和學理架構也跟當年沒甚麼兩樣，只是心靈認身體為歸宿，理想為現實束縛，腦袋已受屁股支配，今是而昨非。因此，我們在當今最有聲望的社會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法學家的文字裏，發現他們跟90年代更不用說80年代判若兩人。他們在晚餐時論證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如今他們率先投靠進有着午餐的體制中去，思想的尊嚴、人性的榮譽、精神的美感、法的統治、革命的權利全讓位於一頓午餐的小康溫飽裏。他們有過青春激蕩的風雲，如今他們消失在中國生活裏了，一代人的頭腦已經下崗，消失在待哺的現代性饑渴而不覺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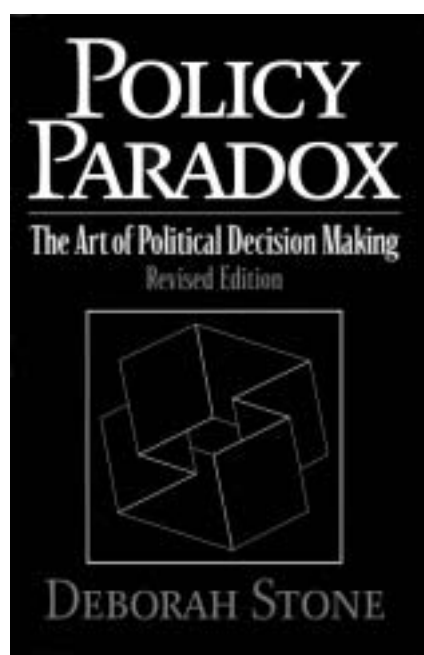
類人孩的體制內生存中去，這是當下中國的悲劇，也是現實和未來悲劇的根源之一。更可悲的在於，他們自得保守地認為，中國生活不存在現代性饑渴，所謂的饑渴只是偏激的、有害的民粹主義搗亂。民眾的生存不需要思想的助力，只需在治道的秩序裏自然演進。

本書作者對此一問題雖少有注意，但他們要求「拓展民間言論」等已經觸及到中國社會和中國精神的問題實質。因此，閱讀本書，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的文化人的歷史和現實。要知道，儘管我們的社會表面上跟他們少有關聯，但我們生活的品質仍跟他們息息相關。

對比起80、90年代，今天的知識界和思想界要矜持保守得多。社會中堅還多是80、90年代的那些人，言說者的知識準備和學理架構也跟當年沒甚麼兩樣，只是理想為現實束縛，腦袋已受屁股支配，今是而昨非。因此，我們在當今最有聲望的社會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法學家的文字裏，發現他們跟90年代更不用說80年代判若兩人。

逃不出價值的園囿

● 賀林平



Deborah Stone, *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rev. ed. (New York: Norton, 2002).

在學術研究中，純粹借助於事實對象和實證方法的理性計算可能嗎？如果說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可以拋開價值偏見的羈絆，那麼，在社會科學領域——比方說，公共政策，這種可能性又有多大？自從經濟學應用數學實證方法獲得巨大成功，從而給自己戴上一個似乎不容置疑的「科學」面紗以後，包括公

美國政治學家拉斯韋爾在上世紀50年代創立政策科學時，就懷抱着把它建成一門「真正科學的學科」的偉大抱負。但《政策悖論》一書開宗明義指出：政策分析的理性工程試圖避開政治性的因素，而單純依靠邏輯和推理的方法達致對真實世界的正確認識，從而得到完全不受「可憎的價值偏好」干擾的科學的理論成果的努力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夢想。

共政策在內的社會科學各學科，都試圖給自己貼上「真正的科學」標籤，在真科學的奧林匹亞眾神之山上贏得一席之地。但是，僅靠極力拋棄本身所固有的多樣性的價值因素，而對純粹理性計算研究方法表達無限依戀，公共政策學科就能獲得同自然科學一樣程度的科學性了嗎？或許是的，美國政治學家拉斯韋爾 (Harold D. Lasswell) 在上世紀50年代創立政策科學時，就懷抱着把它建成一門「真正科學的學科」的偉大抱負。但是，英國學者斯東 (Deborah Stone) 的《政策悖論》(Policy Paradox) 一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解答。

一開篇，斯東就開宗明義表達了自己的鮮明觀點：政策分析的理性工程試圖避開政治因素，而單純依靠邏輯和推理的方法達致對真實世界的正確認識，從而得到完全不受「可憎的價值偏好」干擾的科學的理論成果的努力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夢想。事實上，在任何一个共同體 (polis) 中，政策離不開政治 (廣義的政治，包括了多種多樣價值偏好、鬥爭衝突、權力對抗、非理性、矛盾等等因素在內，可表述為政治性的因素)，就像人的行動邏輯中除了理性以外，離不開無知、偏見、情緒等等非理性因素一樣。

對於政策和政治的關係，秉承實證理性主義方法的宏偉理想的政策科學家總是以一種勢不兩立的絕對兩分法的眼光來看待：政策因代表了理性分析的面向，客觀、忠實於事實、追求整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被認為是純潔的；政治則因為

反映了情緒、非理性、個人私利以及短視而背上了骯髒的壞名聲。政治的無秩序、不可預見性、模糊性甚至成為了遵守秩序的政策分析的敵人。基於這種被看作不怎麼讓人舒服的緊張關係，政策實證主義者渴望用理性決策代替政治衝突和妥協，換言之：就是把政治性因素從公共政策分析中分離出去，不使其妨礙理性對真實世界的「絕對客觀」的研究。

但是，斯東對這種在她看來近乎幼稚的兩分法提出了挑戰，旗幟鮮明地指出，理性計算不可能越過政治因素而直接達於真實世界，理性主義者妄圖在政策科學中不給政治一個位置是不可能做到的。儘管他們之中的過於樂觀者總是相信自己在進行政策分析時沒有受到「骯髒的」政治和價值偏見的影響，但事實往往是：政治要麼以常識性的方式不言而喻地存在，要麼以潛意識的方式隱藏在研究者理論預設的深處，從而使得它們是那麼的不易覺察，而不被覺察顯然不代表不存在。

在此基礎上，斯東認為政策與政治的事實上的正確關係是互相交織、緊密聯繫的，理性分析不可避免是政治的，而政治也從理性分析中獲益良多。因此，一個主要的概念被提出來描繪這種關係——政治推理 (political reason)。在這個邏輯中，理性推理仍然是重要的，實證主義的方法並非微不足道，但關鍵是，推理不是純粹邏輯學意義上，而是有「政治」的限定，事實上，這種限定並非有意識的，而是不知不覺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純粹理性計算為甚麼不可能？政治為甚麼要「可惡地」在人們努力破除價值偏見的願望中插上一腳，使這種美好的願望落空？在這裏斯東給出了解釋。因為現實的世界是個連續統一體 (continua)，其中充滿了漸變性和連續性。自然界包括人類社會本無分類可言，從受精卵發育成一個成年人的過程是不可分割的，你無法說出甚麼時候是非生命，到甚麼時候就是生命了；甚麼時候是未成年，到甚麼時候就是成年了。至於現在有關於生命和非生命之間的劃分、未成年和成年之間的劃分，都是人們依據一定的標準人為地進行的分類。分類的必要性在於，任何理性計算，要形成完整的邏輯推理，都必須以對世界的明確的範疇劃分 (categories) 為前提，只有在分類的基礎上，推理才有出發點。所以，為推理而進行的分類是必不可少的過程，而由於客觀世界本身的非割裂性，分類就必然是人為的。

緊接着是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你為甚麼這樣分而不那樣分？你依據甚麼這樣分？你一定有一個分類的標準，這個標準不可能不帶有價值的因素。一旦另一個人用帶有另外一些價值因素的另一套標準來分，那一定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分法。所謂的「正常人」帶有「自己是正常的」這樣的價值預設把人分成「正常」和「瘋癲」，把跟自己行為極端不同的人歸為「瘋癲」一類；但誰又知道，所謂「瘋癲」的人完全可能用自己的另一套價值標準把自己看成「正常」，而把所謂「正

常」人看成是「瘋癲」的。所以，分類一定是政治性的。

現在的結果很清楚了：理性推理離不開分類，分類是政治性的，所以，理性推理離不開政治，它無法拋開政治而直接達於真實世界，政治是連接理性推理和真實世界的橋樑。

那麼，有哪些因素是作為政治性因素起到分類作用的呢？斯東列舉了象徵、數字、原因、利益和決定這五個因素以說明問題。「象徵」 (symbols) 通過標記性的符號使一件事看起來不像或者更像另一件事來對事物加以分類。「數字」 (numbers) 通過度量的方法對事物加以分類。「原因」 (causes) 用導致事情發展的不同原因對事實加以分類，包括意外的原因、有意的原因、疏忽的原因、執行僵化的原因。是偶發的還是人為控制的？人為控制的應當擔負這種還是那種責任？「利益」 (interests) 通過利益的不同對政治行動主體分類，強勢的和弱勢的，善的和惡的。「決定」 (decisions) 用人們所做的決定對人類行為分類，有可能的還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大還是可能性小？

光分類似乎還是不夠的，分類後確定的類與類之間的邊界是相當不穩固的，因為人們據以分類的價值標準會經常變化，由於各方各類之間的邊界的不斷變動總伴隨着利益的得失，所以邊界緊張 (boundary tensions) 總是存在的。為此，必須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一次次重新劃定邊界，至少有五種方式使得這一工作得以進行。「誘導」

純粹理性計算為甚麼不可能？斯東解釋因為現實的世界是個連續統一體，其中充滿了漸變性和連續性。自然界包括人類社會本無分類可言。但任何理性計算，要形成完整的邏輯推理，都必須以對世界的明確的範疇劃分為前提。由於客觀世界本身的非割裂性，分類必然是人為的。分類的標準不可能不帶有價值的因素。所以，分類一定是政治性的。

直到今天，科學主義似乎仍然牢固地維護着其在政策科學中的主流尊嚴。但這一主流已經受到諸多批評家猛烈攻擊，斯東就是其中之一。這些批評和爭論使得既有的權威理論經常獲得其他非主流思想衝擊的新鮮血液，對於防止學術思想的僵化、迷信，對於延續學術的發展生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而這一點恰恰是中國學術界最缺乏的精神。

(inducement)：趨利避害總是誘導人們去做有利於自己的事情而拒絕不利於自己的事情，使得獲利者和受到懲罰者在日常行為上不同。「規則」(rules)：強制人們去做規則範圍以內的事情而不做規則所不許可的事情。「事實」(facts)：通過事實說服的方式規定了教化和教育之間的界限。「權利」(rights)：權利規定了人們可以做甚麼，政府不可以做甚麼；積極概念的權利界定了政府事實上做甚麼，而一般意義上的權利界定了人們認為政府應當做甚麼。「權力」(powers)：規定了參與和不參與到權力結構中的人，決策做出者和決策接受者之間的邊界。

政策的理性計算因為有政治為認識和選擇做出分類，並且不斷確定類別之間的界限而成為可能，因此，政治推理不可避免是帶有隱喻性的，並且經常是似是而非的，而並非像理性主義者自信的那樣，是一定可以通過邏輯方式推導出一個確定的整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推導出一個非此即彼，一方完全正確，從而壓倒另一方的結果；甚至在描述上都不可能做到說得很清楚，很言之鑿鑿。實際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清官難斷家務事」不僅在政治裏到處存在，在不可能脫離政治的政策過程中也是無處不在。政策爭論源於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深層價值和利益衝突，不是純粹的理性推理可以擺平的。儘管人們普遍同意諸如公平、效率、安全、自由等的基本價值，但是對於它們的千百種不同的解釋，完全會影響人們進行分類的標準，使得不但人與人之間意

見相左，就算是同一個人，他的看法在不同時空也經常發生變化。所有這些就是會產生政策悖論的根本原因。

作者反對聲稱「科學」的純粹理性計算的政策方法，反對在政策過程中故意迴避利益衝突和價值爭論，而主張在一個共同體中增加交流，擴大互動，把爭論和不同意見開誠布公地表達出來，讓別人傾聽、了解、達成互相的理解，形成「和而不同」的局面。而不是靠幾個所謂的技術專家以科學的名義簡單通過一個政策否定另一種聲音，無視其他共同體成員出於不同利益價值偏好的不同意見。這就是政治推理的意義所在。

對立於追求科學和理性的政策過程，甚至要求把政治從政策中完全抽取出去的現代思潮，斯東的思想屬於要求政治重新回歸政策過程的後現代思潮。事實上，這種思潮在政策科學中未必佔據主流地位，直到今天，即使在西方，科學主義似乎仍然牢固地維護着其在政策科學中的主流尊嚴。

但是，現實情況是，這一主流再不是人們普遍迷信和牢不可動的了，它已經受到諸多批評家猛烈攻擊，斯東就是其中之一。這些批評和爭論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它使政策科學時常可以聽到兩種甚至多種完全不同的聲音，使得既有的權威理論經常獲得其他非主流思想衝擊的新鮮血液，對於防止學術思想的僵化、迷信，對於延續學術的發展生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而這一點恰恰是中國學術界最缺乏的精神。